

新时代文物工作

乡村振兴中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唐志强

我国上万年的农耕生产活动孕育了发达持久和长期领先世界的农耕文化,创造了上下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繁衍不息、发展壮大奠定了万代基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

我国先民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农业遗产,广泛存在于社会土壤中,既有物质遗产,也有非物质遗产,还有融物质与非物质于一体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农业遗产的内涵价值的挖掘侧重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从搜集整理古农书并进行校注解读,到对农业技术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灾害史等领域的研究,再到对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和保护利用探索,使农业文化遗产以更加鲜活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物质农业遗产包括传统农业生产生活用具、田契账册、票据文书、农业古籍、各种载体的农耕图像等可移动文物,古代开辟的田地、建设的村落、修筑的水利设施以及其他农业遗址、遗迹、遗物等至今尚存的不可移动文物,以及营造的山林、培育的动植物品种及打造的土特产品等活态物质遗产。非物质农业遗产则包括与农耕活动相关的农事节气、礼仪制度、禁忌习俗、技术技艺等。其中,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非物质农业遗产的本质内容,时至今日依然闪烁着熠熠光芒。

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振兴乡村产业,既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又要充分利用物质农业遗产资源,促进乡村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和品质提升,努力实现农业的多功能性。二是推动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打造诗意般栖居和美乡村,要继续传承村落营建的经验和智慧,实现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传统之美与现代之美的有机统一。三是助力乡风文明建设。建设乡风文明要以其悠远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为滋养,让乡村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变成农村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生产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四是襄助乡村社会治理。建构当代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应高度重视对乡规民约、公序良俗等乡土文化载体的保护,利用非物质农业遗产与村民价值观念相契合、可接受性的特点和优势,完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与政策。

继续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在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是有生命主体、有食品输出,可以维系人们生计的活态文化遗产,包括土地生态系统、种植生态系统、牧渔畜养生态系统、复合生态系统、水利灌溉生态系统等农业综合技术体系,是中华农耕文化最重要的根脉源泉和赖以存在的载体,蕴含着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是传统农耕文化的当代呈现。以最早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这种动植物之间的互利共生模式除了有效地利用稻田空间,增加人类动植物蛋白质食源以外,还通过鱼的游动搅动泥水,为水稻根系生长增加氧气、刺激水稻植株分蘖;鱼儿吞吃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和稻飞虱等害虫,起到了很好的生物防治作用;鱼的排泄物又给水稻施加了有机肥料,培肥了土壤,实现了“地可施肥”,减少了人们锄草、除虫和施肥的投入及其引起的污染,可谓一举多得。该系统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不仅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还增加了不少农民的收入,其年产值超千万元。

截至2022年底,农业农村部分六批发布了138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的18个项目申报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每一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都是一座生物、文化和技术基因库,不仅具有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生产性技艺与生态民俗文化,而且维持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系统和提供独具特色的美学景观,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持续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保障了人类生计安全和生活质量,对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

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

国家在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也正在发生从制度到面貌的迅速变化,亟需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活态传承和系统保护。2021年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把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列为重点项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对包括农业文物在内的全面文物保护利用进行统筹规划。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

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全面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应在继续深入挖掘、重点保护、适当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同时,加强对物质农业遗产的保护和非物质农业遗产的传承。

首先,要切实加强对物质农业遗产的保护。散落在广袤大地和城市乡村的物质农业遗产,不仅是农耕文明的有形物证,往往也是无形农业遗产的载体,有的还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作用。

一是强化对农业科技发明进步关键物证的征藏。应着重研究农业生产生活工具起源、变迁和演变规律,并进行阐述和展示。(例如,朴实无华的传统农具,在上万年的农耕历史上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从制作材料上讲,由木石发展为青铜,进而发展为铁制。从动力和结构上讲,由人力发展为畜力、水力,由简单发展为复杂。)其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智慧创造和发生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科技文明成就,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推进,这些物证已经从农业生产环节中退出,逐渐消失,亟需进行抢救性收藏和保护。

二是加强对历代陶器的收藏、保护和研究。陶器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已从以采集、渔猎活动为基础的迁徙生活过渡到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此后,陶器成为与先民生活最为密切、数量最多的日常用具之一。它反映了各时代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特征,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和切实保护。

三是着力搜集、整理与研究古代农耕图像,汲取农耕文化的精华。从远古岩画和彩陶、商代甲骨、战国铜壶、秦砖汉瓦中的桑蚕形象,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农耕壁画,再到宋元明清的系列耕织图,以及由此衍生各朝各代各种载体中反映生产、生活和文化的农耕图像,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壮丽画卷,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四是全面搜集、整理与研究农业古籍。中国农业博物馆牵头已经搜集到1300多种、约4000万字的古代农书,正在会同知名农业院校进行整理研究,并已纳入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将搭建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和整理利用平台,为全社会的便捷利用提供服务。

五是积极保护农作物、土特产的原产地原生态。当今人类种植的作物都是先民在上万年的农耕历史进程中不断地从其野生祖先中选择和培育而来的。保护好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和各地名优土特产的原生境,保护好利用好传统农作物品种资源和优良基因,让中国种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和优质农副土特产品的供给。

六是保护、阐述和呈现见证中华文明起源的史前重要农耕遗址(遗迹),并适当加以利用。这些遗址为记录原始农业发生和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其原貌和原生态加以保护、研究和展示,有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民族自豪感。

七是加强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要水利设施和环境生态保护,促进悠久的水利遗产焕发新的活力。例如,安徽寿县芍陂、关中郑国渠、四川盆地都江堰、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灵渠、新疆“坎儿井”、世界上最长的内陆运河——京杭大运河、福建莆田的木兰陂、河套引黄灌溉渠系,其中一些工程至今还发挥着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八是原状原貌保护和合理利用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和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先后公布了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人文景观的6819座传统村落、487个历史文化名村、312个历史文化名镇。这些村镇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保留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根基。

其次,不断加强非物质农业遗产的保护。21世纪以来,许多非物质性农业遗产已在国家四级非遗保护体系中得到系统的保护。二十四节气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06年,“农历二十四节气”成为首批非遗项目;2016年,二十四节气成为人类非遗。2018年,秋分被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各地每年开展庆祝丰收活动。2022年,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入选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向世界展现中国气质。然而,仍有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性农业遗产,例如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生态文化、精耕细作、资源持续利用的农业技术文化、团结互助、和谐相处的乡村治理文化的做法、经验和智慧,尚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再次,着力加强对农业农村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一是要利用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空间优势,倾力打造全国农业文明的博物院和永不落幕的农业博览园,发挥国家队的示范带头作用。二是在现有的生态博物馆基础上,完善和提升现存上千个各类农耕主题文化场馆的功能,使之成为农耕文化活态传承、动态保护的重要阵地。三是从上百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八千多座国家级传统村落中,选取一批自然条件与人文资源整体资源情况较好、有代表性的文化单元,在田间和乡村农业遗产的第一现场创建的集保护、保存、展示、传播为一体的农业农村生态博物馆,让优秀农业遗产活起来。

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向世人展示了其无穷魅力与风采。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当下,我们应当共同守护好先民留下来的这份珍贵遗产,稳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子孙后代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苏区时期毛泽东的五次吉安调查

钟平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础,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做深入细致的调查。1930年是毛泽东的调查年,他在吉安农村连续作了五次社会调查,通过与群众干部面对面交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全党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树立了光辉典范。

五次调查的背景

五次调查的背景:一是攻下吉安城后如何巩固红色政权,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很多;二是对兴国调查的延续,着重解决土地革命中深层次的问题。

1930年10月4日,红军九打吉安成功,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苏区内县、区、乡、村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大多数县开展了土地革命。10月底,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第一次“围剿”红军。10月30日,毛泽东前往新余参加罗坊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抽空特地从兴国县出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来八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深入调查八户农民家庭的详细情况,史称“兴国调查”。这次调查中,关于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如何保证根据地的群众利益,使群众全力支持反“围剿”斗争;关于苏维埃地方政府是否健全和巩固,是否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关于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农民的经济来源和生活状况等问题,毛泽东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于是带着这些问题,在1930年冬罗坊会议结束,毛泽东返回吉安部署红军撤退转移途中在吉安的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和木口五个村作了五次社会调查。该调查是随机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其调查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农村当前土地分配情况;二是关于村乡两级苏维埃政府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形式;三是关于对待富农、小地主、中农的政策等。

五次调查的地点及过程

东塘村调查

1930年冬,毛泽东在参加新罗坊会议后,带一个警卫班经峡江前往吉安,贯彻“诱敌深入”的方针,布置红军撤退。11月7日,毛泽东身着便装,风尘仆仆地来到吉水同水区第十五乡东塘村(今枫坪乡东塘村)苏维埃政府驻地老众厅。刚检好马,还未安顿住下,立即与前来迎接和安排他休息的村政府秘书兼该村贫民小学教员胡德顺了解情况。他亲切地询问东塘村老表的分田

情况,尤其详细调查了胡德顺一家的分田情况及生活状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调查了吉安至吉水阜田一带的农村家庭副业情况。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所住的“老众厅”后栋右边房间里,在一盏美孚灯下写下了《东塘调查》。

大桥村调查

1930年11月8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从东塘来到吉水金滩区第九乡的大桥村(今黄桥镇大桥村),当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寒风习习。毛泽东进村子后,全然顾不上休息,就在大桥“帮伯第”祠堂门口召集村主席杨修恩和部分群众在一起,亲切拉起家常,嘘寒问暖,多方面了解情况。随后,还托人找到该乡政府主席孙修恩和大桥村几个村干部召开座谈会。毛泽东首先调查了这个乡五个村的土地分配情况、农民经济情况及农民不足够吃的办法,接着询问了金滩区征兵情况,向干部与群众宣传扩红支援前线的意义。毛泽东在座谈中亲自口问,随身带的纸张不够,他便用小小烟盒纸详细记下来。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他写下了《大桥调查》。

李家坊和西逸亭调查

1930年11月8日下午,毛泽东马不停蹄从吉水大桥来到吉州区区长塘镇,分别在李家坊和西逸亭村作了专题社会调查。毛泽东的李家坊调查,主要是想通过乡村干部和群众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他着重调查了村政府和乡政府的行政范围、机构设置、经费来源以及工作人员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在西逸亭村,毛泽东重点调查了土地分配情况,通过调查,他发现“以村委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认为利于富农不利于贫农的以村为单位的土地分配方法是应该改变的”。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他认为:“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利用空隙时间,他写下了著名的《李家坊调查》和《西逸亭调查》。

翻转课堂在博物馆研学中的移植与应用

——以洛阳博物馆研学课程为例

李晨飞



学生实地布置



学生沟通设计辅助展示内容

随着教育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活动的意见》等政策的发布与实施,博物馆研学迅速崛起。“到博物馆去”成为更多青少年的研学选择,博物馆研学也成了博物馆教育职能的重要体现。

许多博物馆都推出了主题和形式多样的研学课程,博物馆研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受场地、展览、教研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研学课程仍存在课程模式单一、内容同质化、缺乏创新等问题,教学模式也容易走入“传统说教”和“重参观轻实践”的误区,导致研学效果不佳。翻转课堂(The Flipped Classroom)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教学形式,2011年在美国各地兴起后,迅速引起多方关注。翻转课堂主张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教师不再是教学中的权威,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朋友和引导者。这种新型教学模式,与博物馆研学“提升中小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实践性学习以及开放性学习内涵,拓展学生视野和综合素质”的精神内涵有极高的契合度。该教学模式在博物馆研学中的移植和应用,有助于突破“泛泛参观”,实现探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践,助力博物馆研学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洛阳博物馆《我是小小策展人之“我眼中的古都洛阳”》(以下简称《小小策展人》)研学课程被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文物局联合认定为“第四批河南省研学实践教育精品课程”。该课程成功地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植入博物馆研学,结合当下流行的“职业体验”,为博物馆研学课程实践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切入点,具有一定的学习借鉴价值。

洛阳博物馆《小小策展人》研学课程的课程主题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策展人、我、

古都洛阳。展览是观众与博物馆建立联系的第一道桥梁,学生的研学内容之一是了解博物馆的策展工作,研学任务是化身“策展人”,以“我眼中的古都洛阳”为题策划、实施一个完整的迷你展览,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策划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我”即学生,展览要以学生的视角展现古都洛阳的风貌,课程完全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探究、创新和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古都洛阳”是展览主题,也是学生在研学过程中除了策展之外,需要重点学习的内容。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学生通过了解洛阳历史的发展脉络,建立起河洛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宏观概念,进而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因此,课程以历史文化能力和培养为两大立足点,通过《一个展览的诞生》《泥彩陶香》《金辉煌》《盛世华彩》(Show time—展览呈现)五个阶段性课时的学习,最终达到核心素养目标和教育教学目标。

洛阳博物馆《小小策展人》系列课程于2022年暑期实施多次,收获了学生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被学习强国、河南新闻广播、今日头条、洛阳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反响。该课程构建了基于陈列展览和展品的博物馆教育新模式,研发了逻辑关联紧密、层层递进的教学活动和丰富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使课程展现出了传统“参观+手工”模式的研学课程所不具备的明显优势。

一是以学生为本,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学生的研学任务是策划并实施一个真实的展览,从主题的解读到策展单元的拟定,从大纲的编写到展品的制作,从展览的视觉设计到策展布展的实施环节,完全由学生的创意主导,研学导师从旁指导和辅助,使学

生成成为课堂的主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探究的创新性精神。

二是激发学习内驱力,培养主动学习、合作学习的能力。学生基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成果最终需要转化成展品和展览,并面向公众真实开放。在此研学任务的激励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得以高度激发,有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同时,策展工作是一项将构思与资源整合的智慧劳动工作,需要多人协作共同完成,学生在分组筹备展览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团队协作、合作学习的重要性。

三是多学科知识综合运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课时设计合理紧凑,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学习和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层层递进,通过问题解决的模式建立“教”与“学”之间的对话,将传统的课堂教学转变成历史、语文、数学、德育、美育等多学科联动的个性化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及核心素养的提升。

四是丰富的研学场景,增强学生体验感。为了给学生提供更真实的策展体验,基于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和研学时长等因素考虑,展览的实施场地为洛阳博物馆一楼面积约60平方米的真实展厅,展柜、灯光等专业设施俱全,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研学场景,营造了沉浸式的研学体验。

翻转课堂在博物馆研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为博物馆研学课程的设计和实施了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研学兴趣、学习动机和潜力,对丰富研学课堂模式、优化研学实践成果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随着博物馆研学旅行和学校教育衔接的不断深入,相信翻转课堂在博物馆研学中的应用会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助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